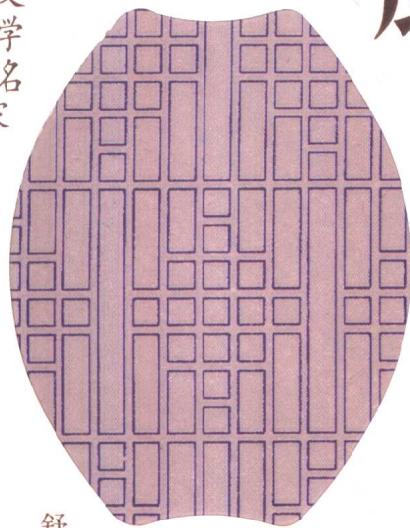


眼中战国成争鹿
海内人才孰卧龙

康有为

集选



近代文学名家
诗文选刊

舒芜
陈迺冬
王利器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康有为选集

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舒芜 陈迺冬 王利器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有为选集/康有为著;舒芜、陈迺冬、王利器选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
(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ISBN 7-02-003349-0

I.康… II.①康…②舒…③陈…④王… III.①康
有为-选集②诗文-作品选集-中国-近代 IV.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8531号

责任编辑:宋红 装帧设计:翁涌
责任校对:杨华 责任印制:周小滨

康有为选集

Kang You Wei Xuan Ji

舒芜 陈迺冬 王利器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22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625 插页2

2004年1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349-0/I·2560

定价 21.00元

隔着新世纪的门槛往回看

——写在“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前面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建设、发展，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带着难以忘却的创痛、带着取得成就的喜悦、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走进了二十一世纪。

一百年前，二十世纪之初的1900年，英、法、德、意、美、俄、日、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一百年后，二十一世纪之初的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的今天，在中国人已经站起来和正在富起来的今天，做一番百年回首，看看蹒跚于二十世纪之门的中国，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之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先给中国人送来了资本主义。当大清国那一直闭锁的破败国门被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轰开之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为现代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所震惊。意识到：此夷狄非彼夷狄，“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财利，其隐赆流溢

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之矣，又莫测其所以然”（严复《原强》，《选集》第25页、31页）。于是，“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洋和学习西洋成功维新变法的东洋，希望从那里找到变法图强的良方，因为当时的局面正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所说：

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

然而东西方社会、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使“拿来”也变得不是那么唾手可得。正如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以至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同上文）的情况。由此可以想见，东西方文化间的交融是怎样一种化合的过程。当时的“体用之辨”，即具体反映了两种文化的碰撞。而当新科学、新学科引进中国之后，则大大激发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思想界之活跃，实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声。

在火光血影中写成的中国近代文学，记录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解体和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蜕变的阵痛；记录了一百年前中国人艰难跨入二十世纪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中国人为了民族前途和命运所做出的探索和牺牲。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民族的神经，往往能提前感知时代的风云际

会。而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则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优良传统。已经站起来和正在富起来的中华民族,到了该让自己“硬”起来、“强”起来的时候了。回顾一百年前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做一番抚今追昔的反思,便是我们编辑“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的初衷。

丛书原拟为十种,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定为目前的七种,一次推出。即:

《龚自珍选集》(孙钦善选注)

《康有为选集》(舒芜、陈迩冬、王利器选注)

《梁启超选集》(王蘧常选注)

《严复选集》(周振甫选注)

《林则徐选集》(杨国桢选注)

《翁同龢选集》(马卫中、张修龄选注)

《秋瑾选集》(郭延礼选注)

其中前四种为我社原有出版物的改版重排,后三种为新书。

所以使用重排本,以其为之做注者都是学界知名人士,可以说是“名家”注“名家”。虽注释体例有不尽规范之处,所下断语亦难免带有时代烙印,然释作品背景之周详、注历史典事之精到,则是后来人很难逾越的。加之选注工作被当今学界视为小道,或根本不算科研成果;或在计算成果时大打折扣,致使当今要找到笔下“应有尽有”和“应无尽无”的新注家非常不易。

重排中,我们对旧注本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一、删除“落后”、“反动”等游离于正文之外的空泛政治性结论;二、改正个别不确切的僻字注音和语词注义;三、改正注释中的引文差误;四、

改正原书排校错误；五、与新注本求得大致相同的体例。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旧注本的以下两种情况未做处理：一、征引史料多为撮述，虽加引号，但并非严格引文者，如《梁启超选集》即属此类情况；二、对所注出典有不同见解者，如《严复选集·三月三日……游万生园》：“何曾三起继三眠，却笑万生成万死。”注〔11〕曰：“三起三眠：《三辅故事》：‘汉苑有柳，状如人，号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细味之，三起三眠似当指蚕眠，而非柳眠，即《本草》所谓“蚕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也就是蚕由初生到成蛹的时间。若“一日”之内而“万生成万死”，何乃太速耶？然在做注者已归道山的情况下，此类问题不宜强加于人，故一仍其旧。

鉴于当今注释人才之难得，我们尤其应该感谢为丛书之新选题担当选注工作的几位先生，特别是杨国楨先生。为丛书做注时，杨先生的女儿病情危重；注稿完成之日，正女儿撒手尘寰之时。杨先生在《林则徐选集》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女儿深深的歉疚和思念，于此我们亦向杨先生和他已故的女儿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请相信，一个青春女孩的生命正以书卷形式在我们中间延续着，我们希望杨先生因此而得到安慰。

有研究表明：1840年前后，中国在上世界上还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远超德、法、俄等国。当年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武器落后，并不是火炮射程够不着人家，也不是我们的军费投入不够。据史料记载，甲午海战时的北洋水师在舰船吨位、航速、火力等方面与日本海军或是相差无几，或是互有优劣。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

的优长,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之最,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无如此规模的装甲防护。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我方均占优势,只有中口径火炮,日本稍稍领先。总起来看,双方实力大体相当,北洋水师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然而,北洋水师惨遭失败,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舰未沉!人们不禁要问: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答案很清楚: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清廷腐败无能,军队素质低下。这就是为什么英军拿不下一个小小的虎门炮台,却能让整个大清政府屈服的原因。如今,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的惨痛教训。

中国人的强国梦做了一百年了,龚自珍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翁同龢说:“留取世间真道德,看人扼腕献奇方。”(《小游仙》)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秋瑾说:“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梁启超说:“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少年中国说》)

与一百年前相比,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全没有理由悲观;但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人家却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与当年的那八个国家相比,我们更没有理由盲目乐观。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百年来，国歌中的这句话其实不止一次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响起。我们没有时间走弯路、更没有时间走回头路了！好在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为我们勾画了越来越明晰的发展蓝图，“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开除球籍”，“中国人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葆有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性格，不忘海纳百川、雍容大度的汉唐精神，“聚精会神地”搞建设、谋发展，中国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温故而知新，便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现代意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3.8.

前 言

一

康有为诗文选的编选出版,是为了纪念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十周年,同时也是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诞生一百周年。因为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戊戌变法运动本身有很大弱点,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本质上有反动的一面,所以一到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就使他堕落成为反动的保皇主义者和复辟主义者。这就不能不有所批判。

因之,我们编选康有为诗文选时,只选他进步时期的作品,除少数几篇特殊例外,一般不选他反动时期的作品。其次我们在注释方面,也企图尽量阐明这些诗文怎样反映出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运动的情形,康有为怎样用文学的武器为他所领导的进步的政治运动服务,运动中的做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以及诗文中的思想观点哪些在当时是值得肯定的,哪些是应该批判的。我们还编了一个简单的年谱附录在后面,帮助读者了解康有为由进步而反动的整个的一生。

鲁迅先生说过:“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

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反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我们所要纪念的，就是康有为的“趋时”和他所“趋”的那个“时”，纪念他的“拉车前进的好身手”；所要批判的，就是他的“拉车屁股向后”，批判他后来的“永定为复辟的祖师”。

二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于中国革命的旧民主主义阶段，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关于康有为那一派人物，毛主席还说：“……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毛主席这个指示，是我们认识戊戌变法运动和康有为当时情况的最高指导思想。

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里面，对于戊戌变法运动，对于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他的政派的日益反动的发展，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作了深刻、全面的分析：

“中国人民曾经长期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面。一百多年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略中国，暴露了当时中国的封建皇朝完全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外来的侵略

和压迫愈来愈厉害,国内的政治也愈来愈黑暗。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对外关系上实际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广大人民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开始进行了英勇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许多的先进人物,为了救中国,为了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努力去寻找真理。他们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以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他们在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就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

“在一八九四年中国被日本战败以后,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变法运动,就是这种企图的一次尝试。他们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和拥护。他们虽然是改良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变法运动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他们的活动,在一八九八年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了。

“一八九四年中国的失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运动。同康有为一派改良变法运动的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其他几个革命派的运动发展起来了。在康有为一派失败以后,它们在一九〇五年组成了革命同盟会。这一派和改良派不同,他们抱着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这就比改良派大进了一步。

“清朝的统治,在革命势力迅速发展的情势下,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欺骗人民和抵制人民的革命,在将近五十年前,清朝统治者宣布了‘预备立宪’,并且在一九〇八年公布了一个‘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专制制度,虽然在表面上不能不许诺人民一些要

求,但是人民不相信这种许诺是真的,不相信这种‘立宪’能使中国进步。人民抵制了这种骗人的‘立宪’。这个时候,对于这种‘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则采取了拥护的立场。因此,改良派也受到了革命派的反对,并为人们所抛弃。”

康有为和他的政派的政治生命,到这时已经完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产生了中华民国之后,康有为已成为一个政治幽灵,他却仍然不肯退出政治舞台。他一直反对民国,到了1917年,积极赞助反动军阀张勋,拥戴早被推翻了的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图谋复辟,颠覆民国。当时的形势,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因此,改良派人物也都不敢追随康有为,只有他个人堕落到公然与封建妖孽之流为伍。张勋的叛乱在全国愤怒声讨之下迅速失败,从此,康有为的生涯便在众叛亲离的孤独和黯淡之中告终。

三

刘少奇同志的总结,已经把最主要最基本的东西概括无遗。至于一些细节,则在本书的注释当中,在附录的年谱简编当中,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只想着重谈一谈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前面已经引过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这个问题的指示。毛主席还指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

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分析当时的历史，可以了解这样几点：一、戊戌变法运动和当时康有为的思想之所以是有进步意义的，就因为它们的目的是“要救国”，学习的目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二、康有为的思想，是自洪秀全到孙中山这一个系列中的一段，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上层士大夫当中酝酿已久的改良主义思潮的一个总结，也是他以前许多先进人物不断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开花结果，他的大同思想明显地受到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梁启超一再歌颂他为“先时之人物”，“二十世纪新中国史之开卷第一叶”，“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暗合”（《康南海传》），那是故意夸大，与事实不符的。三、但是，康有为改良派对于在它之前就出现了的、表面上也像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却并无继承关系。洋务派的目的，不是救国，而是要加强封建官僚统治，加强同帝国主义的勾结，促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本质上与改良派不同。戊戌变法运动中，洋务派尽管有时也与改良派成立过联盟，但总的说来，是站在反动方面的。四、改良派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来改造中国，固然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但也正是它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连革命派都无法实现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改良派更加软弱，只希望用请愿的手段向一个无实权的皇帝求得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所以必然遭到失败。五、但改良派所向往的西方，仍然会引起反动派的恐惧和仇视。当时反动派中的顽固派，害怕一切西方传来的新事物，甚至把外国人已在

中国筑成的一小段铁路购买回来再拆掉。这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西方传来的新事物，是在动摇他们千百年因袭下来的封建统治的秩序了。

第二，戊戌变法运动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使西方的影响停止传播。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鲁迅先生有生动的回忆。青年鲁迅于一八九九年即戊戌变法失败后第二年，到南京进学校。他在矿路学堂的第二年，学堂的总办是个“新党”，维新的思想便在学生中大大流行，曾经是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的一部书，严复翻译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赫胥黎的论文《天演论》，也就在这时被青年鲁迅惊喜地发现，强有力地吸引住他。封建势力立刻来干涉了。“‘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长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騄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饼干、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朝华夕拾·琐忆》）

可见，慈禧太后对变法运动的镇压，能够迫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杀死了谭嗣同等六位烈士，罢免了黄遵宪，吓退了严复，而已经传播开来的先进思想对广大革命青年的影响，却是无法扼杀的。青年鲁迅通过这种先进思想的引导，在新的革命高潮推动之下，就远远突破改良主义者所画定的范围，走上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

第三，戊戌变法运动给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刘少奇同志已经指出：革命派原来和改良派同时活动着，而“在康有为一派失败以后，它们在一九〇五年组成了革命同盟会”。这情况，有些近似洋务派彻底破产以后，改良派接着登上

历史政治舞台。变法运动对于后来的革命，直接、间接留下不少经验和教训。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指出：“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这就是戊戌变法运动，特别是它的失败，对后来的革命最直接的教训：要实现民主，要有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必须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不能吝惜血的代价。而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尤其同任何改革不相容，为实现国家的改革，非用革命武装斗争把它推翻不可。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里指出：“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现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

但戊戌变法运动对于后来的革命，还有更深刻的教训，这就是毛主席指出的，当时所要实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康有为所幻想的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实现大同，尤其不可能。康有为的“大同书”早已写成，由于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现实的通路，视为渺远无期的理想，一直不敢发表；而到了后来公开发表，则已是用作反对民主、反对社会主义的武器，用意是表示：大同的理想我早就有了，但必须经过我所拟定的由君主立宪开始的道路，你们这样搞只是乱来一气，无益有害。

今天我们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道路，将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推向前进，而且还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迈进而斗争。我们的道路过去和将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但无论怎样，真正大同理想的实现，不再是渺远无期的事。我们将

要实现的大同,和康有为幻想中的大同,有根本的不同。这时我们纪念并批判戊戌变法运动和康有为,应该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是: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才是人类幸福最高理想——大同理想的实现者。离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大同理想这样的先进思想,也会被歪曲成正好相反的东西。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这个伟大使命,不是其他阶级能够代为承担的。

四

康有为的一生,本书附录的年谱里面,已经介绍了一个轮廓。这里来画一个更其粗略的轮廓。

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生于1858年(清咸丰八年),卒于1927年,享年七十岁。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官僚地主的家庭。他的家乡,是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和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最早的地区。他的青年时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规模的瓜分殖民地的过程急剧进行的时代;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老大封建帝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急剧进行的时代;是国际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是中国农民革命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最高峰,仍然英勇不屈地掀起了不断的革命浪潮,强烈冲击着封建统治的时代。他幼年所受的是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十九岁始从朱次琦受封建的“济人经世”之学。但现实的刺激,国家的命运,使他对于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感到它的无用。二十二岁,通过张鼎华,才接触到改良主义的思潮,同年又在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地秩序,推想到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的优越性,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